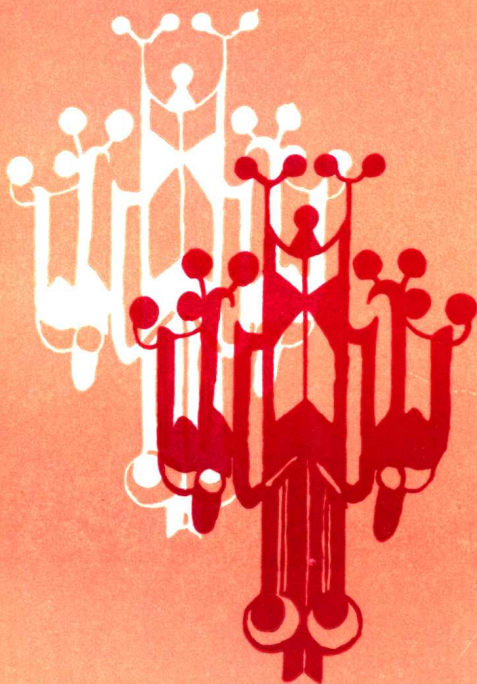


鲁迅与萧红研究论稿

姜志军 著



97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鲁迅与萧红研究论稿

姜志军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1号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关于鲁迅研究与萧红研究的专题学术著作。主要对鲁迅先生的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新看法,对鲁迅作品的童心类和杂文的语言艺术亦进行了切合实际的论述。鲁迅先生的创作对萧红创作的影响,萧红女士对鲁迅先生的敬仰之情和深切怀念,鲁迅散文与萧红散文的异同,也进行了透辟的阐释。在萧红研究方面,本书未求面面俱到,而是求新求深求是求真,既探索萧红成才的原因,又寻找萧红创作的历史局限,既有对其创作风格的剖析,又有对其美学追求的拓展,既有对其作品的宏观扫描,又有对其单篇的研读品判。此书对研究鲁迅萧红有较高学术价值。

责任编辑 王裕江

责任校对 项 瑛

装帧设计 李 丽

鲁迅与萧红研究论稿

Lu Xun Yu Xiao Hong Yanjiu Lungao

姜志军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79号)

哈尔滨市科技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6.5 字数 15000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207-03042-8/I·482 定价:4.50元

序

姜志军同志的学术著作《鲁迅与萧红研究论稿》即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请我作序，我欣然同意，并为他连连不断地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而欣喜。

姜志军同志读大学时，曾听过我的课，我很了解他的人品文品和孜孜以求、奋斗不已的精神。他为人真诚坦荡，热情助人；为文严谨，长于探索。在其文章中，常见其精深独到，予人以真知灼见，我很佩服他，因此我们也是很要好的朋友。

姜志军同志出生在贫苦的农家，他的童年是很不幸的。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从故乡山东省来到黑龙江省宾县乡下，挨饿讨饭，历尽艰难。因无学费，11岁才迈进小学的门坎。但他不懊悔，用勤奋和刻苦来铺垫自己的人生之路，又一步一个脚印地在人生旅途上写下自己无愧的履历。也可能是他立志要当一个好“杂家”，即好编辑的原故吧，他学海泛舟，博学多才，在刚入不惑之年之际，已经出版著作、主编、参编的学术论著14部，发表论文数十篇，还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数十篇，其论文多次获奖。因业绩突出，三年前被破格晋升为副编

审,并被吸收为国家级5个学术团体的理事或会员,是一名很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在此,我也为他在艰辛的跋涉中,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表示祝贺。

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化的旗手,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的作品博大精深、奥秘无穷,我们学习鲁迅精神,研究鲁迅作品,继承鲁迅文学遗产,对加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当代文学创作等,均很有益处。姜志军同志在此方面做了很好的努力。他对鲁迅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的研究,可谓有独到之处。《阿Q形象的多重奥秘探源》是一篇很有创见的新论。关于阿Q形象的探奥,自《阿Q正传》问世以来,一向为读者瞩目,且论著洋洋洒洒,观点众说纷纭。因此,该文从选题的角度看,有较大难度;对前人似成定论的论说的突破,尤属不易。这里应该说表现了姜志军同志在学术研究上一贯勇于探索的精神。该文的另一特色是,虽意在拓展旧说,但并不偏执,能够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上,注意博采众长,开拓前进。因此,论文材料翔实、立论扎实,令人读之可信。

该文的最精辟之处,在于从多侧面剖析阿Q形象,因而突破了历来的社会学分析诸多见解。把阿Q形象看作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并且作者善于从创作方法的交融、审美智能的差异等多种视角审视阿Q形象和诸多评说,令人耳目一新。其它篇章,也论述透彻,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恕不一一评说。

姜志军在萧红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曾兼任呼兰师专萧红研究室秘书、呼兰河萧红研究会常务理事、国际萧红学术研讨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他研究萧红创作风格对北大荒文学风格的影响,论证得相当精辟,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赞扬;他研究萧红小说的美学追求,写得入情合理,神采飞扬;他

研究萧红的小说、散文、诗歌，不求面面俱到，而是取其精要，意到为止，篇篇都写得新颖别致，耐人品读。鲁迅与萧红是两代人，是师生关系，但他们思想有相通之处，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作者论及鲁迅对萧红的创作影响和萧红对鲁迅的怀念之情时，也很有分寸，恰到好处。欲想品其论稿的真味，还请读者阅读一下此书的原文。

还值得一提的是，姜志军的书稿在语言方面也有些创新。他打破了论文写作语言较呆板的现状，在保留论文语言洗练、准确、流畅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语言的清新、飘逸和华丽，使其论文的语言颇具文采和美感。试图将论文写成美文，增添论文的可读性和审美性，不能不说是一种可贵的探索。

眼下，正是北国繁花似锦的五月，《鲁迅与萧红研究论稿》亦是开放在学苑的一枝鲜花，她将以其独到的学术价值，为我国的学术百花园增添色彩和芳香。我也衷心地祝愿作者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将这缤纷的五月，变成金色的十月。

钟汝霖

1994年5月于哈尔滨师范大学

目 录

阿 Q 形象的多重奥秘探源	(1)
论鲁迅作品的童心美	(11)
鲁迅杂文的语言艺术	(25)
《阿 Q 正传》人物形象异说	(34)
鲁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	(48)
萧红对鲁迅的真挚情感	(65)
——试论《回忆鲁迅先生》的抒情艺术	
鲁迅萧红散文比较谈	(76)
走向世界文坛的女作家	(95)
——国际萧红学术研讨会综述	
萧红成才探索	(111)
“萧红式”与北大荒文学风格	(125)
论萧红小说的美学特征	(136)

论萧红小说的诗意美·····	(147)
评《呼兰河传》·····	(158)
关于《生死场》的命名问题·····	(171)
避实就虚 标新立异·····	(175)
——《旷野的呼喊》艺术谈	
一枝香美的散文之花·····	(186)
——读《家族以外的人》札记	
萧红散文艺术二题·····	(194)
漫论《萧红自集诗稿》·····	(201)
萧红作品对赵国辉小说的影响·····	(217)
后记·····	(224)

阿 Q 形象的多重奥秘探源

阿 Q 从鲁迅先生的笔墨里活脱脱地跳将出来，立即在文坛产生了轰动效应。世人从阿 Q 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于是乎猜度、惊栗、愤愤不平；继而是怀疑、反省、研究、品评。仅就阿 Q 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形象问题，纷纷然争论不休，阿 Q 是“不觉悟的农民”说、是“超阶级的思想典型”说、是“国民劣根性”说、是“奴隶性格”说、是“轻度精神病患者”说等，各执高见，结论不一。由此可知：阿 Q 是一个寓意深广、极为复杂的典型形象。那么，阿 Q 形象具有多重奥秘的因由何在呢？笔者试图对此作一探讨，愿能为正确理解鲁迅笔下复杂的人物形象寻找捷径。

一、与鲁迅知识渊博、思想精邃有关

作品是作家的产儿，一个作家的生活经验、知识储量、艺术修养、思想境界如何，直接影响着作品质量。凡文学艺术珍品，皆出自博学宏才、见多识广、洞察是非的大家之手。《离骚》、《红楼梦》、《人间喜剧》、《悲惨世界》等名篇巨著，无不与

作家思想艺术博大精深有关。

鲁迅学贯中西，吐纳古今，在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滋养下，阅力颇深，思想精邃，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至境。

鲁迅从小就熟读了中国封建文化典籍十三经，虽然他后来鄙视某些儒学的封建糟粕，并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写在〈坟〉后面》）但是从掌握知识的角度看，对鲁迅也并不是没有裨益的。特别是当时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受到轻视的“经世之学”和野史、笔记等，使他产生了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思想萌芽。先秦以后的优秀作家作品，对鲁迅亦影响颇深。屈原、王充、嵇康、陶渊明、阮籍、吴敬梓，魏晋笔记、唐传奇、唐宋诗词、元杂剧、明清小说，鲁迅都从中批判地汲取其艺术精华。在极富学术价值的《中国小说史略》中足见鲁迅对中国古典小说和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刻造诣。

鲁迅对外国的文学、哲学、思想和思潮具有开放意识，并择取其菁英。日本、俄罗斯、波兰、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优秀文学作品，鲁迅都悉心研读，从中获取真知。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民主主义思想，达尔文的进化论，以施蒂纳、尼采为代表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潮，对鲁迅的思想都有过重要影响，特别是马列主义，在鲁迅的先进世界观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鲁迅将渊博的知识、精邃的思想浑然融一，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便容易使他作品中的人物呈现出一种多重性和深刻性。阿Q这一典型形象正体现了这一点。

阿Q的自高自大，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实际是他病患心理体现出来的“正常”心理现象，同时，鲁迅又用阿Q影射了当时正常人身上存在的国民劣根性。正因为鲁迅具有相当的医学知识，所以他描写的具有轻度精神病的阿Q才如此

活灵活现。请看，阿Q不知美丑，不识好坏，与正常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行为。譬如，他主动跟王胡比捉虱子，败下风就挑逗、打仗，当他反被王胡打败后，认为是第一件屈辱的事（其实何至于第一件）；他“失业”的根源，本在赵太爷，可他却责怪小D，并与小D为难；自己行盗，却将“经验”公诸众人。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神经不够正常的人。他想入非非，言行可笑。因拧了小尼姑的脸蛋，便想起了女人，继之便跪下向吴妈求婚，直截了当地央求与吴妈“困觉”，以为这样一做就可以实现“理想”，就能避免“断子绝孙”，这是正常人不可思议的。更有甚者，死到临头令他签字画押时，他还恨自己的圆圈画得不圆，这更是一种病态的反映。鲁迅学过医学，通晓病理，所以他塑造的狂人、阿Q才那样真实可信、生动逼真。当然，鲁迅描写带有轻度病态心理的阿Q，意在影射和批判正常人的痼疾——精神胜利法。何以见得呢？因为鲁迅笔下的“精神胜利法”，实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鲁迅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揭示了精神胜利法的社会和历史的内涵。阿Q常说的“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正是统治者的心理状态。当西方列强用坚船重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对国人进行野蛮掠夺和奴役的时刻，统治者却念念不忘当年中国的强汉、盛唐、四大发明、历史道德；对外屈辱自安，对内奴役自大，毫无改革图治、富国强兵的设想，这岂不是十足的精神胜利法吗？精神胜利法不单单表现在统治者身上，它还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物身上得以显露，只是表现的形式和具体的内容不同罢了。

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对国民劣根性的问题有着鞭辟入里的研究，他对人们在民族危难关头表现的麻木不仁、

妄自尊大,尤为痛心忧虑。鲁迅凭着知识的渊博和思想的深邃,看到了道教、儒学、佛家思想对国民的精神毒害。我们可以看到,精神胜利法中,有老庄哲学的无视客观物质存在,追求主观绝对自由、悲观遁世、寻求虚幻境界的色彩;有儒家孔学的强调伦理、心理原则,排斥个人的努力和理想追求,忍困度难,固陋守穷,从而达到人格自我完善的样子;也有逃避现实、缅怀已往、幻想未来的道家佛家思想谱调。正因如此,阿Q的性格愈加复杂,其典型意义也就愈加深广了。欲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一典型,也就更加困难了。

二、与鲁迅吸取融汇古今中外的创作方法有关

以前的论者多认为,《阿Q正传》所用的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它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使用了多种创作方法。几种方法互相交织、融合,浑然一体,出色地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刻画,深化了作品主题。正是由于创作方法的多样化和高效应,才使得阿Q这一人物形象更加复杂了。

不容否认,《阿Q正传》的主要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鲁迅在《阿Q正传》中注意了对现实生活及其细节的观照,并力求较真实地予以再现。鲁迅在涉笔之前,对客观生活有过细致的了解、深切的体验和精辟的透视。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鲁迅:《呐喊·自序》)也见过赵太爷、假洋鬼子、知县大老爷、带兵的老把总、王胡、吴妈等一群自高自大、自我安慰、愚昧麻木、忍辱屈从、排斥异端、安于现状的国民。就阿Q来说,他的许多思想言行,也有许多真实生活影像的折射,如阿Q其人的原型,就很像短工

阿桂和周家的破落子弟桐少爷。阿Q的无姓无名,如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名字也无从可考(当然与鲁迅的有意安排有关),实际和鲁迅自己的生活经历也有关。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时,他的叔祖周椒生看不起鲁迅,觉得鲁迅穷酸到交不起学费,念这种免费的洋务学堂,不能走科举仕途而光宗耀祖,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故不许鲁迅使用家谱中的名字,将“周豫才”改成了“周树人”。大量的现实主义手法对客观生活的再现,便决定了阿Q这一典型形象具有了“不觉悟的农民”说、“雇农流浪汉”说、“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说……总之,阿Q是一个生存于特定社会环境之中的鲜明生动的真实人物形象,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现实主义典型。

《阿Q正传》中的某些浪漫主义创作因素,又使阿Q超出了现实主义范畴。阿Q这一形象,有许多思想言行是通过夸张而漫画化了,超出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细节真实,呈现出一种怪诞色彩。如阿Q在戏台下的赌摊上赢了些洋钱,一下子被人抢走了。他说自己是虫豸,算被儿子抢走了,心中还是郁郁不乐,于是他举起右手,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这才算出了恨气,心平气和地在土谷祠里躺下了。阿Q在土谷祠中做的革命胜利的美梦、被杀头前恨自己的圆圈画得不圆等等,都是通过想象夸张而达到讽刺目的的浪漫主义手法。高尔基说:“如果从既定的现实中所抽出的意义上再加上——依据假想的逻辑推想——所愿望的、可能的东西,这样来补充形象——那么我们就有了浪漫主义,……而且它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它帮助激起对现实的革命态度,即实际地改变世界的态度。”(《文学论文选·苏联的文学》)鲁迅在《阿Q正传》中有时通过浪漫主义手法理想化地塑造典型,来表现其政治

思想倾向和美学观,不完全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样子,不加粉饰地描写和再现,而是将人物放在理想世界和现实社会之间,表现一种高度概括的具有哲理内涵的思想意义。鲁迅通过联想,将理想与现实、革新与保守、生存与死亡等重大社会问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在笑声中感到悲凄,在愤恨中进行思索,使读者通过喜剧的形式,领悟到悲剧的内容。这种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运用,就使阿Q这一形象的意蕴更加复杂了。因此,认为阿Q“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是超阶级的精神胜利法的寄植者”、“是对于整个人类弱点的批判”等等,专就思想意义而言,这些说法确实是有道理的。

鲁迅在塑造阿Q这一形象时,也融进了象征主义的创作手法。安特莱夫认为“要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鲁迅对此做出合理的借鉴。象征手法完全可以用具体形象表现抽象概念、思想和情感,以弥补现实主义表现思想内容不够广泛深刻之不足,便于使形象和思想达到完美统一,使读者在更深层次上领悟作者的创作意图,从现实上、哲学上、心理上浮想联翩,升华到更高境地。阿Q的“先前阔”是民族自大、满足古代文化文明的象征,“癞疮疤”是封建思想和社会弊端的象征。鲁迅曾说:“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成了“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乃不可言。”(《热风·随想录三十五》)阿Q的屈服于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害怕赵太爷的打嘴巴,对弱者又是“口讷的便骂,力气小的便打”等等行为则是“中国人但对于人显凶兽相,而对凶兽则显羊相”(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七》)现象的象征。从这种意义上说,阿Q“是一种精神的性格化和典型化”。(冯雪峰:《论阿Q正传》))

如上所述，鲁迅在塑造阿 Q 这一形象时，确实调动了各种创作手法，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手段，巧妙地交融在一起，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以其它为辅，相辅相成，天衣无缝，使得阿 Q 这一形象深蕴警拔，寓意丰赡。它既真实，又荒诞；既晓畅易懂，又耐人寻味；既表现了外在世界，又表现了内在世界；既表现了客观生活，又表现了主观精神。达到了情与理、灵与肉的和谐统一。思想更加丰富，寓意更加深刻，艺术更加辉煌了。当然要理解阿 Q 这一复杂的形象，也便愈加费力了。

三、与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委曲的表意有关

《阿 Q 正传》是描写的辛亥革命时期的现实生活，反映的那个摇摇欲坠时代的精神风貌。而那时的社会生活又是非常复杂的。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刚刚在中国传播，一些有识之士希望新社会快快诞生，祖国强盛，人民富足，不再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就是宣传民主与科学，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与封建统治者和腐朽势力斗争的先锋和闯将。可是当时朝野上下，被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吓破了胆，他们对外屈服投降，不抵抗，对内又欺上瞒下，掩盖失败的真相。统治者还用一套冠冕堂皇的假话来欺骗恫吓人民，以维护腐败无能的统治；人民由于缺乏民主与科学思想，愚昧麻木，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昏昏沉沉，不思改革。辛亥革命由于缺乏群众基础，犹如一阵风刮过，实效甚少。封建势力的顽固和实行改革的困难，使国人产生了一种“精神胜利法”。这种时代的痼疾，在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物身上，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形成了一种社会灾难。鲁迅要将这些复杂的社会内容通过

一个阿 Q 表现出来，必须增大阿 Q 这一典型的社会含盖面。思想内涵愈加深远，形象意义十分复杂。因而读者在理解这一形象时势必会感到困惑，甚至会出现理解上的偏颇。

《阿 Q 正传》的俄文译者王希礼称赞鲁迅是“真诚的‘国民作家’，是社会心灵的照相师，是民众生活的记录者”。他在自己的译文本序中指出：“鲁迅在自己的小说《阿 Q 正传》中，把自己的讽刺不仅指向中国 1911 年假革命，而主要是指向旧中国的旧文化和旧中国的社会，例如有时描写自己的人民当中的平凡的人物的形象时，他嘲笑了他们的无能软弱，但这只是含泪的微笑，因为作者本人的同情，始终是在被侮辱和生活毫无保障的人们的一边的。”（戈宝权：《〈阿 Q 正传〉在国外》）《阿 Q 正传》的法文译者敬隐渔也说：“这篇小说，是对所有的有闲人，有产者，士大夫，一句话，是对整个中国旧社会的一切缺点，卑劣，虚伪，无知……的一次辛辣的攻击。”（见敬隐渔法文本《阿 Q 正传》前面的短文）据此我们说，阿 Q 囊括了复杂的社会内容，他本身也必然复杂。理解阿 Q，就要寻“画外之境”，闻“弦外之音”，方得其宗旨。

鲁迅在表现复杂的社会痼疾时，为了斗争的需要，又使用了委婉诙谐的曲笔，以免招来政治麻烦，影响自己的斗争工作。比如《新青年》直接宣传马列主义，就曾遭到胡适等人的反对，对《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官场和统治者对文化战线的进步思潮也横加干预，残酷迫害。这样，委婉曲折地表现社会现实，就更有利于和敌人的斗争。对于委婉表意这一点，许多论者有所认识：“有时，也许作者为了环境关系，有意地把最本质的东西放在极不相称的环境里——如把精神胜利的士大夫精

神，放在雇农的阿 Q 身上用以侧面讽刺辛亥革命，在表面上是非常不相称的。”（巴人：《鲁迅的创作方法》）冯雪峰在《论阿 Q 正传》中也指出：“阿 Q，主要是一个思想的典型，是阿 Q 主义和阿 Q 精神的寄植者；这是一个集合体，在阿 Q 这个人物身上集合着各阶级的各式各样的阿 Q 主义。”这就是说，各种委婉手法致使阿 Q 形象更趋复杂化了。

四、与审美主体接受审美信息智能差异有关

在文学鉴赏过程中，不同的鉴赏主体对同一鉴赏客体，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进而得出不同的美学评价，这是与审美主体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生活经验、文学艺术修养、性格爱好不同分不开的。鲁迅在论及《红楼梦》时曾说：“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看书琐记》，《鲁迅全集》第 5 卷第 430 页）“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 7 卷第 419 页）这种主体差异性，以致“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上）

一部文学作品或艺术形象，不同读者可以依据自己的鉴赏水平，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去理解其思想内涵，评判其美学意义，当然会产生不尽相同的结论。

以上我们是从文学鉴赏的视角去看此问题的。如果再从接受美学的体系去考察，作为接受主体在接收审美信息时，其接收频率，信号强弱，映象效果也是不同的。有的反映图象比较清晰，保持原貌；有的反映图象比较模糊，看不清楚；有的反